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

——推进“马学”“中学”互化融合*

吴文新**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践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成功样板，其意义正在于它要避免美国式物质霸权帝国的前景。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一种独特的“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动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走向融合，在学理上厘清“中华文化”的深刻和独特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必须在世界历史及其文化激荡融合视野中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即它是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性交融的历史产物；为此，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和文明担当。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互化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践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成功样板。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进入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势崛起呈现为一种猛不可挡的历史趋势，并且数年来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持续关注和热议；随之便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根据西方几个世界性帝国的崛起历史和经验，认为中国崛起必将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之侵略扩张的覆辙，而引起世界性的纷争和战乱。无论我们如何向世界表明我们的和平发展、共赢共享的价值理念，也难以平息世人的疑问和责难。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必须另辟蹊径，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MZD04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 吴文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休闲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转化发展。

必须为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否则难以享有 5000 多年悠久文明之智慧民族和和平大国的“中华”“中国”之美誉。在物质性的经济发展较难体现独到之处的情况下，发挥我们独有的文明优势，为人类创造一个独特的和平文明之典范，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主张，基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现实，面向 21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大力推进“马学”与“中学”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便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光荣伟大的文化使命。

一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融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也日渐增强。同时，国际竞争愈益向着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领域转移，中国也必须迎接这个挑战，否则“中国”和“中国人”等概念将失去其特有的文化意涵。中华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享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再次向人类做出绝不逊色于中华先祖的伟大贡献。否则一个与美国无异的扩张性物质帝国——“中华帝国”，无论从物质上还是文化上都势必为人类带来灾难。中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或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或反过来叫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但是这条“互化”的道路可谓荆棘丛生、坎坷曲折，百余年来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大体说来依然在探索之中。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简称“中华文化”）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范畴，把中华文化复兴纳入了中华复兴的伟大战略之中，而且大张旗鼓、有条不紊地开展了中华文化的宣传教育和传承弘扬活动，影响巨大、令人振奋。但是依然未能在学理上说清楚被中国共产党奉为指导思想和内在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常常在公开的学术会议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中华文化学者，或者自说自话，互不相关，或者相互蔑视、相互诘难，或有极端者还相互攻击、相互否定。中央高层也只是做了些原则性、战略性的论述，习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①；但二者在深层学理和具体可微的操作层面是怎样的关系，无论学界、政界或民间学术组织，都还没有呈现出有深度的成果，多数人多数时候依然各行其是，独说自话。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页、第41页。

很显然,这种状况肯定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中华文化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两种信仰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何以有这两种信仰体系?一个政党同时信仰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是可行的吗?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有说服力的回答,那就势必造成党的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缺乏正确认知的干部和党员在信仰上的模糊和动摇,以至于无所适从。这一点从人们对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之内容解读的分歧上就能感受得到^①:有人把三个倡导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普世化”的标志,认为这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有人解读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向民族传统的自觉回归;有人直接解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化,核心和精髓依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体现;当然,也有人站在“更高”的高度认为,三个倡导是中国共产党融合“中”“西”“马”的文化结晶,是全新的理论和文化创造,等等不一而足。

这个关系究竟如何?学界、政界尚无清晰而精确的说法。这也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深层(文化、哲学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层面的)关系,作为理论家和实践家高度统一的党的领袖们,只是出于中华复兴的客观需要、国际竞争的文化压力以及民族文化的敏锐直觉、承传责任和弘扬使命,而提出基本原则和战略构架。在学界,因为缺乏认真精细的深度研究、逻辑严谨的理性认知,以及系统深刻、圆通灵活的哲学或理论表达,而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内容严整、逻辑自圆、表达清晰的思想方案。显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必须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以作为全党全民族能够坚持不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信仰体系。这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展所必须开展的一项伟大文化工程,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使命。

二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各自的变迁中互化融合

首先需要界定下中华文化的概念。其一,中华文化不同于国学。国学不仅包括作为价值和信仰体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包括各种非价值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包括文学、艺术(书法、歌舞、戏曲等)、建筑、民俗、节日、手工艺(如剪纸、手塑)、陶瓷,包括武术、养生、医学、宗教等;这里的“中华文化”是狭义的国学,即作为精神性、价值性、信仰性的文化部分,是国学的灵魂和精髓,它渗透并表现于各种形式的器物、规则、活动和技艺性的文化之中。其二,本文所谓“中华文化”亦即“中学”在内容上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简称,是一种狭义的界定和理解。但广义而言,中华文化不仅包括具有悠久历史、底蕴深

^① 吴文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文化读解——不同主体的践行视角》,《理论学刊》2016年第1期。

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包括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甚或追溯到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者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后两者大致有100~180年的历史；但从历史传承看，后者本质上是前者的特殊发展形态，是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即中华文化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形态。因此，某种意义上亦可说后两者就是中华文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结合或融合形态。

对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即“中学”和“马学”的关系，实际自马克思主义开始传进中国以来就开始探讨了，特别是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界，已有汗牛充栋的著述，在立场和观点上亦可谓百家争鸣，各有优胜。但大略综观，不难发现，自五四至改革开放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机械套用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或灵魂的阶级分析方法^①，刻意地用阶级性标准将中华文化分析为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进而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取舍，甚至极端时干脆把中华文化几乎全部作为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糟粕”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但在“国学界”，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些人固守“中华文化立场”，成为旧时代、旧文化的顽固代表；不少学者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机械地套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格式化”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不能不承认，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中国人迎来了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大好机遇；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随着对中华思想宝库的深入挖掘和整理研究，而日益展现其丰富性、深刻性和某种“后现代性”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本质也正在日益系统地呈现在国人面前，二者在超越时空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即对人性结构的深刻剖析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方面的高度契合与深层关联，都在日益“澄明”。显然，正是那种简单化的、机械的因而也是庸俗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史观”，成为造成二者关系不堪窘况的深层思想方法根源。

鉴于此，我们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基于对中华文化的经典阅读和体会，独立地审视这个问题。概而言之，把握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思路：差异—共通—（互补）协同—融合。具体而言，二者在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本体论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前提下，在中国这个大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背景中，确有许多深刻而丰富的共通之处，多方面的互补与协同，不仅从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上不断地实现着二者之间的某种互化和融通。我

^① 一段时期，我国学术界确曾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简单化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并机械地理解和运用“精华”和“糟粕”的二分法，显然，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整体性、丰富性、历史性和辩证性，从而造成我们在理解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学理关系上遭遇巨大挫折。

们认为，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关系是历史的，也是客观的，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事实，而且这一最终趋于融合的文化前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厚实的未来价值。

但是，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通常我们思考二者关系，总是讲到它们能够沟通，能够互补与协同，能够实现某种融合，却往往对这种融合之后所能呈现出的一种怎样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样态，缺乏深入的思考。从文化演进的本质来看，辩证的否定观及其所揭示的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昭示我们，辩证逻辑是一个事物形态拓扑性依次递进的演化逻辑，不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一个民族形式的转化及新形态的生成，而且中华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甚至与西方及世界其他思想文化发生碰撞激荡之后，也会有一个形态上的变迁。但是，这两种变迁是分别地、平行地且互不相干地进行的吗？还是它们之间又存在强烈的相干性？或者说这“两种”变迁，只是一种思辨性的学理区分，它们实质上就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有着共同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我们更倾向于后两种说法。在中国，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变迁在历史实践中，由于其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互读互释互融互化——因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是呈现出两个方面或两面性，那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的历史结果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后者的历史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前者是理论的形态，后者是实践的形态。二者除了理论和实践形态上的区分外，已经不具有实质性的差异了，故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是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

三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交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的视角，或者是世界历史性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角，这个视角对于我们完成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直接来看，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基因的作用，因而具有几千年中华文化现代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①其中170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中华民族与世界历史相碰撞、相激荡、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内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9~40页。

地包含了近70年社会主义探索和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而这都是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中华文化有着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诸多的相同相通、相契相融之处，并且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汲取、相互转化，从而在社会形态的塑造上形成了一种同向合力。这种必然性，表面看似跟世界历史无关，但实际上，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或人类文明演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积极影响、实践改造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主动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的产物。试想，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中华文化恐怕还沉醉在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狭隘僵化的孤芳自赏之中。正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其赤裸裸残暴野蛮的殖民扩张历史，强烈地震撼并动摇了中华文化及其根基，从而惊醒了中国的“文化人”们！这种震惊促使一部分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龚自珍、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探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至于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所有文化人必谈的话题，由此，这种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作用，便必然地形成中国化的现代社会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化。这个“化”的过程，无论是在生产力、科学技术、经济结构，还是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无不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影响，无不彰显出中华文化的自强精神和厚德智慧。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世界历史性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会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那更是来自西方的最先进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思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互释互融互化的结果。

质而言之，那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而孤立地看待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必然性、合理性的观点，不是思考视野狭窄，就是缺乏世界历史常识。同时，那种脱离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高度契合的精神特质，及其近代转型的根本趋势，来“没文化”地看待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片面的、肤浅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将跃升为“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这既是世界历史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体现和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交汇于中华文明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一种文化产物，如称之为“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那就意味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表达、文化形态和文明类型。

显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不能再向世界贡献一个类似美国那种巨无霸的物质帝国，它需要特别着力探求的，就是如何在最大限度降低物质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上，创新建构最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生存、文明享受及自由发展需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生死的考验。因为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具备这种能力，不仅不具备，反而是造成一切冲突和灾难的最深刻根源。目前主导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其他主义，是融汇了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文明范畴内的社会主义。这一点，必须明确！因此，“中国特色”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之所在，其本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浓郁的中华文明的特殊色彩。“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悠久历史的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①或可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就是“中国特色”的主旋律、主色调。

四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化融合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和文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越来越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逐渐形塑为一种“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完成一项对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文化使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负责，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责任担当，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须进行的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宏伟工程——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的已有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从学术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读互释互融互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有清晰系统的经典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②这显然彰显了“中”“西”“马”三种世界主流文化的视域融合，是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化互融的指导战略。据此，我们把这一使命和担当勾勒如下。

第一，梳理总结并凝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释互化的历史及其经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它与中华文化互读互释互融互化（以下简称“互释互

^① 王岐山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化”)的历史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被迫进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轨道,中华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直至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和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逐渐产生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五四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十八大以来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生存发展需要而有不同的任务和内容,互释互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各有不同,总结这段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释互化的具体过程和经验,这对我们面向未来的互释互化之全新理论建构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和思想资源意义。同时,这也是在梳理二者互释互化的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及其辩证关系,以便从中汲取持续推进二者互释互化的思想方法和智慧。

第二,建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释互化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释互化是一个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并行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二者互释互化之历史成果和经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原则“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①主张“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②我们要将这一原则具体化、精细化,贯穿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读互释之中。进而言之,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其核心是基于辩证逻辑的泛演化逻辑^③),在“马学为魂、中学为根、西学为用”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坚持“问题导向、未来面向”,抽象继承中华神髓、具体应用现实转化、综合创新建构新语^④,以形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下,建构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真理性价值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体系,它应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社会真理和价值、社会理想和信仰体系,它带有最大限度的人类“普世性”,因而可以引导国家走上一条与人类前途和命运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203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729647,2014年9月25日。

③ 何新《哲学思考》,时事出版社,2010。

④ 此看法受程恩富教授有关论述的启发,并稍加修改和阐发。他倡导,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载《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17~237页)此原则也与方克立“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主张,及张岱年、陈先达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出的相关主张高度吻合。

休戚相关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学为根”或“国学为根”，就是以中国国情、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目标为思考问题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为发展的基本力量支撑，以源远流深的中华文化为根源，充分挖掘中华文化在修养意识、涵养道德、提升人性，在仁政德治、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等方面的特殊优长，不断弘扬、优化和提升我们的民族根性、人民素质和文明境界。“西学为用”就是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工具化、物质化的优势和成就，借鉴他们善于逻辑思维和外求实证的特长，学习他们重视法制建设及社会他律的做法，将之转化为能够为我所用的适用性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治理手段。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等基本国情，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纲，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向21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样的学术原则和科学研究方法论并非一种先验的逻辑架构或预设前提，而是以上二者互化之历史研究的逻辑结果，是一种基于此前文化或文明进化之历史过程的理性考量。

第三，推进中华文化的精髓及其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中华文化历经5000多年，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内容渊博、形式丰富，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互有分工、各有特长，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①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中华文化进行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讲话中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

^①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2636876>。

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②。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思想精髓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③，并分别有合宜的撷取和精准的凝练，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参照。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中华文化宝库进行归纳整理、概括总结、提升凝练，形成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适性、宽厚底蕴的深刻性、植根现实的时代性、问题导向的实践性和面向未来的先进性等特征的中华文化精神要髓的体系框架，以体现中华文化屹立于人类文化之林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对其所做马克思主义新阐释，将中华文化置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宏大历史格局之中，使之获得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全人类的“普世”意义。

第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的中华文化新阐释。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相区别，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化”阐释有不同，这个新阐释要按照21世纪新的时代特点和人类进步需要，依托中华文化精神要髓，背靠世界历史、立足中国当代、面向人类未来，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内在于中华文化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灵魂，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精神追根溯源的逻辑解读，更重要的是用中华文化的话语方式和价值理念来阐释这些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精神，并赋之以民族文化形式，使之转化为当代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对中华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阐释相对容易些，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华文化新阐释则要难得多。而其难正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信仰体系，它源于西方文化、植根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而又立足最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奴役的现实困境、面向全人类摆脱奴役而自由发展的实践愿景，显然和中华文化有着历史时空、民族主体、文化背景和方法路径的显著差异。但是，从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都可以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大致对应的表述，二者深层的相通相契、相协相合之处已然相当突出。因此，运用中华文化的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终极追求，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时代化、大众化和“天下化”的新阐释，实际上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机地嵌入中华文化的基本和核心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729647>。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203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5/c_1120383155.htm。

思想理念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性、道德和精神境界的思想融入中华传统美德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终极关怀融入中华人文精神之中，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呈现为中华文化的话语方式，同时也使中华文化提升到一个更为“普世”的层面，与上述对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形成相向而行的呼应格局。

第五，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释互化之理论成果的逻辑建构。实际上，以上两个方向的相互阐释，是一个阐释过程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另一个方面的工作，二者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相向而行、科学对接，最终的理论成果会在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必然形成全新的思想理论架构。在理论上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在形上本体的深层基础和文化土壤中有机结合，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华文化基本精神融为一体，着力于夯实天人合一、公道民本之整体论基础，大力推进旨在形塑中华人格、发挥经世济民功能的世界观、历史观、人性观、价值观、修养论、实践论等方面的综合创新与逻辑建构，形成新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和“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体系。这里，“天人合一”在中华文化中有其身心合一、天人相应的神秘性的一面，但取其整体性的思想精华，把“天”理解为一切外在于个体人的客观环境、外在于社会化人类的自然环境，那便是强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和整体属性；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相契合，而且也与它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生产紧密联系的思想相一致。“公道民本”是大公之道与人民为本（根）思想的概述，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公”和“民”的思想，这正与马克思主义追求公有制及在此基础上指引劳动人民求解放、做主人、得自由的思想相融通。如果说天人合一凸显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及由此考察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视角，那么公道民本则彰显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历史的普遍联系及由此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天人合一、公道民本，或可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之间相同、相通、相契、相合、相融、相化的精髓内容皆可由这八个字的“微言大义”引申演绎开来——从形上到形下、从道到器、从明体到适用、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制度、从境界到规范、从目的到手段、从动机到效果等，都一以贯之，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高度融合之精髓——或可成为“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的严谨科学逻辑和崇高信仰追求^①。

第六，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原中华文化圈内诸国对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发展及其启示。中华文化广泛传播于周边诸国，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目

^① 笔者曾对“天人合一、公道民本”有过专门论述，参见吴文新《当代中华信仰的本体基础探析》，《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前多数已经或正在实现现代化，尽管制度选择各不相同，但中华文化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有“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模式”之说。显然，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广布于海外诸国的“新儒学”“新道学”，乃至具有某种时代化色彩的佛学流派，其思想成果尤为丰富，并具有扎根当今世界现实、旨在缓和乃至消除人类困境的价值功用，都值得作为中华文化母国的中国推进其转化发展和伟大复兴而研究借鉴。

第七，探讨并落实资本主义全球化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释互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必须承认一个世界历史事实：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改变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历史阶段这一世情。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给世界贡献一份引领人类前途、改善人类命运的“中国方案”，它带有中华文化特质和社会主义性质，人类的和平、合作、共建、共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或可成为现实。由此彰显我们这一文化使命即文明重塑工程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终将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这条道路、这种制度、这套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亦需要通过文化创新和文明重塑来彰显、来支撑，并使之更加持久广泛地发挥作用。

显然，以上工作不仅是理论和学术工作，更是一项实践工程，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实现这种互融互化。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这种互读、互释、互融、互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信仰践履过程，这一过程因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所以，它必然会发生世界历史性的影响。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Marxism Learning” and “Chinese-tradition Learning”

Wu Wenxin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avoiding the prospect of an American-style material hegemonic empi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be a unique “Chinese civilization socialism”. This requires u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rxism, clarify the profound and uniqu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Marxism. We must examine the cultural origi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view of the agitation

and fus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 that is to say , it i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 we must spare no effort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ulture , which is the cultural mission and civil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mission; Marxism; Chinese culture; Mutual integration in the New era